

史诗
《东方红》

创作者口述史

黄卫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史诗
《东方红》

创作者口述史

黄卫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书中采访的人物既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主创人员,又是新中国与新文化的风流人物,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构成了多声部话语,映照中蕴含共性,碰撞中引发思考,批评中富有建设。访谈录呈现了《东方红》的生产背景、创作规律、文本解读、传播过程,以及宏观和微观的文化演进轨迹,为研究者提供了可资佐证的历史文献资料,对当下的文化建设与文化传播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诗《东方红》创作者口述史/黄卫星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302-31842-2

I. ①史… II. ①黄… III. ①访问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6911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王静怡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课件下载: <http://www.tup.com.cn>, 010-62770175 转 4506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40mm 印 张:17.25 字 数:270千字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40.00元

产品编号:050010-01

序言

新中国与新文化的一部经典

李彬

1977年，国史上一个寻常而奇崛的年份，用《万历十五年》英文书名来说，貌似“无足轻重”的年份（*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此前一年，以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采取非常手段，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问题，结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后一年，中央工作会议以及紧随其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年代。

1977年，在我自己人生历程中也印象深刻。上一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下一年，成为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即所谓“七七级”（今人以为七七级自当七七年入学，其实七七级与七八级同年进校，同年毕业，相距一学期而非一学年）。作为业余“音乐爱好者”，自己留在1977年的鲜明记忆当属“解禁”的老歌——《洪湖赤卫队》《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些排山倒海的黄钟大吕，激荡着历史风云，洋溢着时代气息。“黄河之水天上来”，“万里写入胸怀间”，铸就了中国现代音乐以及现代文化迄未逾越的高峰。特别是《东方红》，更以沧海横流的史诗性和大江东去的精气神，象征性地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追求复兴的生命意志与心路历程，英风飒飒，生机勃勃，动人魂魄，蔚为壮观，也在自己心底留下荡气回肠的悠远回声。此时，距离这部经典的问世已过去13年了。

1964年10月2日，又逢金风送爽的时节，《东方红》作为国庆十五周年献礼作品在人民大会堂上演。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而《东方红》则如一颗精神原子弹，在新中国文化领域卷起惊涛拍岸的千堆雪。巧的是，同月16日，新疆戈壁大漠间炸响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就在当天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剧组全体成员，周总理宣布了这一消息，事先提醒大家不要过于兴奋，免得地板受不了冲天而起的喜悦之情。因此，《东

方红》剧组最早获悉这一捷报。至于《东方红》山呼海应的感染力，从当时一位清华学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可见一斑，文章题为《上了生动的一课》，作者胡锦涛：“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不仅是一场很好的歌舞，而且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是党领导下的四十多年革命斗争的缩影，是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它赋予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从此，这部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云集当时一流艺术家的音乐歌舞作品，就同交响诗《嘎达梅林》《红旗颂》、管弦乐《瑶族舞曲》《北京喜讯到边寨》、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帕米尔之春》、钢琴协奏曲《黄河》、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舞剧《红色娘子军》《沂蒙颂》《丝路花雨》、电影《阿诗玛》《刘三姐》、现代京剧《沙家浜》《杜鹃山》等音乐精品，一同进入新中国的文化经典长廊。其中，不仅凝聚着新中国60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而且体现着现代中国一以贯之的文化政治，国庆35年的《中国革命之歌》和60年的《复兴之路》，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这一点。不妨说，把握了《东方红》的文化蕴含，就无异于感悟了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魂。

作为歌、舞、诗、画的综合性创作，《东方红》以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抒写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艰苦历程。下列家喻户晓的曲目，凝练传神地勾勒了这一曲折历程以及这部经典的政治意味，绘成了一幅“长夜难明”到“雄鸡一唱”的东方红图景：

序 曲

歌舞：《葵花向太阳》

歌曲：《东方红》

第一场：东方的曙光

舞蹈：《苦难的年代》

歌曲：《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歌曲：《工友歌》

歌曲：《农友歌》（领唱：王昆）

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

第二场：星火燎原

表演唱：《就义歌》

舞蹈：《秋收起义》

表演唱：《拿起武器闹革命》

舞蹈：《井冈山会师》

歌曲：《双双草鞋送红军》

歌曲：《井冈山》（领唱：寇家伦）

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歌舞：《打土豪分田地》

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

第三场：万水千山

表演唱：《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

舞蹈：《飞夺天险》

歌曲：《飞跃大渡河》

歌舞：《情深意长》（独唱：邓玉华）

舞蹈：《雪山草地》

歌曲：《过雪山草地》

歌舞：《陕北会师》

歌曲：《会师歌》

歌曲：《七律·长征》（领唱：贾世俊）

第四场：抗日的烽火

表演唱：《松花江上》（领唱：张越男、李光羲）

歌曲：《义勇军进行曲》

表演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表演唱：《到敌人后方去》

歌曲：《游击战》

歌舞：《游击队之歌》

表演唱：《大生产》

歌曲：《南泥湾》（独唱：郭兰英）

歌舞：《保卫黄河》

第五场：埋葬蒋家王朝

表演唱：《团结就是力量》

歌曲：《坐牢算什么》

舞蹈：《进军舞》

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舞蹈：《百万雄师过大江》

歌舞：《欢庆解放》

歌曲：《解放区的天》

歌曲：《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

乐曲：《国歌》

歌舞：《伟大的节日》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歌曲：《赞歌》（独唱：胡松华）

新疆舞

歌曲：《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独唱：才旦卓玛）

民族舞蹈

歌曲：《歌唱祖国》

全场合唱：《国际歌》

围绕这部经典，流传着种种传奇般的故事。比如，《东方红》从动议到上演不过一个半月，涉及70多个单位，3700多人，包括30多首歌曲、9部大型舞蹈、18部歌舞表演、18段朗诵等。再如，周总理忙完一天的国务活动后，常常凌晨一两点钟来到剧组，和大家一起讨论，大到思路，小到细节，无不亲力亲为，广为流传的《颂歌》就是根据他的意见重新创作的，而这首名曲本身又近乎一个传奇。当时，周总理审看开国一段场景，觉得应该再加一曲男高音蒙古长调，以烘托新中国旭日东升的恢弘气象。于是，年轻的蒙古族歌唱家胡松华“临危受命”，赶到剧组，以刚刚深入草原牧区的鲜活灵感，通宵达旦，一挥而就，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就此诞生，风行天下：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手举金杯把赞歌唱……

在新中国开国元勋中，文采风流大有人在，毛主席的诗作自是脍炙人口，周总理的文化品位与艺术修养同样传为佳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先生，为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人的退休生活做过如下设想：毛泽东嗜书如命，当会高卧终日，手不释卷；周恩来喜欢邀集文人墨客艺术家，高谈阔论，畅叙幽情；邓小平无论干什么，都和家人在一起。有这样热衷文化、尊崇艺术的总理与导演，《东方红》的成就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周总理首先是一位政治家，所以一开始他就明确地指出：《东方红》是部政治作品。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说，他清晰地将其定位于“文化政治”。同时，他为《东方红》确立了“史诗”的基调：“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要采用史诗的写法”、“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中国革命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

笔者曾就《东方红》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魅力，向中央党校李书磊教授就教，他的一个观点一语中的，令人茅塞顿开：审视这部史诗之作，最适于用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气象”。确实，《东方红》给人最直观、最深刻、最难忘的感触，就是那种吞吐日月、浑然一体的气象。气者，气息悠长、气韵生动、气冲斗牛、气吞万里、气势如虹、力拔山兮气盖世之谓也，一切生命其实无不凝聚为一口气。而象者，可观、可感、可思之形象也、意象也、境界也。气象既属于美学的境界、艺术的境界，更体现着一种整体的生命状态与时代精神。生命有蓬勃孱弱之数，气象有豪放婉约之别。“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慷慨悲歌的沉雄气象一向为古典时代所推重，所谓“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而《东方红》则堪称现代文化史上闳放豪迈的壮伟之作，借用古代文论学者吴建民博士的阐发：

雄浑的“气象”是生命力强旺蓬勃的体现。这种“气象”雄壮宏大，有着强健刚劲、勃勃跃动的生命力……对此种“气象”的观照，也就是对蓬勃生命力的观照……观照这种“气象”，观赏者能够获得生命力的鼓舞和激励，从而产生无穷的审美快感（《古代文论中的“气象”观》）。

总之，《东方红》既是新中国文化艺术的一次巡礼，也是现代音乐舞蹈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道路上取得的一大成就，实现了周总理所期许的目标——“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今年适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 周年。此时,这部《〈东方红〉创作者口述史》将在北京这个中国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化的发祥地付梓,自然多了一层耐人寻味的含义。

就社会进程及其象征意味而言,《讲话》发表以来的 70 年是现代中国亦即新中国诞生、成长、壮大的时期,也是现代文化亦即新文化日益自觉、日渐丰满、日趋成型的阶段。以延安为标志,如果说之前的中国政治与文化还处于半土半洋的氛围,就像当时的文字半文半白,那么经过此后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的洗礼,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精神已经彻头彻尾“现代化”了。虽然时下对民国“范儿”的想象貌似葱葱郁郁,甚至频见口吐莲花,弄得列强侵袭、军阀割据、日寇凶暴、独裁专横、民不聊生的长夜难明赤县天,好像“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但终归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思古幽情,浩浩汤汤的现代潮流早已渐行渐远,恰如“四五”天安门诗抄所言:“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这一切浓郁蓬勃的现代气息,都点点滴滴体现于本书前言所谓“新中国与新文化”,体现于主导新中国与新文化的历史动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以全新的现代面貌登上历史舞台的,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现代意味,洋溢着焕然一新的现代气息。诚然,中国革命的主体来自泥腿子,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的领袖也常带着泥土气,但若据此将这一重塑世界、再造中国的运动视为既往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等,那么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不说别的,如下镜头便意味深长:长征途中,野外露营,围着一团团篝火,红军将领或用德语朗读《共产党宣言》,或用法语高歌《马赛曲》,或跳起俄罗斯水兵舞……按照陈晋先生的说法,这支革命队伍其实很“洋”气,而所谓“洋气”就是“现代气”。这种“洋气”或“现代气”不是偏好问题,也不是风尚问题,而是现代潮流或世界潮流洗礼、浸淫、涤荡而焕发的精神气象。

通常说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万世一系的天朝体制或天下体系就宣告失灵,中华帝国由此一步步汇入现代世界体系。在这个血与火的苦难进程中,从生产方式到社会制度,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模式,中国无不发生着或改天换地或习焉不察的变化,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当属中国人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觉醒,以及相伴相生的现代国家与现代文明。可以说,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这一觉

醒与崛起、复生与再造的社会进程连绵不绝，一以贯之。毛泽东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的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可以视为这一进程的精炼概括。因为，没有自觉自醒的现代政治民族，就不可能开创自强不息的现代国家与现代文明；而政治独立与精神觉醒始终离不开一种文化自觉，离不开现代文化的建设与传播。

大致说来，这一自觉自醒的历史进程，已经经历了三个时期或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五四运动。这场决定现代中国命运与方向的运动，既是波及广泛的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运动，又是旧邦新造的社会政治工程；既以李大钊、胡适、鲁迅、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德先生、赛先生等文化符号彪炳于世，又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的诞生等政治事件闻名天下。以往与当下总有对“五四”的片面解读，或突出其思想文化的启蒙意义，或强调其社会政治的历史功绩，而没有意识到“五四”的救亡与启蒙实际上第一次鲜明体现了现代中国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政治民族的自觉与自醒，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就是“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用1907年26岁的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一文的阐发：

外之既不外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立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第二次浪潮是三四十年代以延安为象征的“左翼新文化运动”，仅仅“鲁艺”文化人本身就足以显示这一现代文化史上大河奔流的宏阔声势：吴玉章、茅盾、周扬、丁玲、萧军、冼星海、周立波、光未然、贺敬之、刘白羽、李焕之、郑律成、何其芳、陈荒煤、艾青、张庚、吕骥、刘炽、王朝闻、严文井、孙犁、秦兆阳、马烽、西戎、冯牧、古元、江枫、华君武、吴印咸、蔡若虹、张仃、穆青、崔巍、陈强、王昆、于蓝、王大华……“左翼新文化运动”不仅确立了新中国立国之本——《新民主主义论》所阐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宗旨，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意识，而且产生了一批洋洋大观的现代文化经典，迸发着一种鲜明的、生机勃勃的现代精神。比如，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矛盾论》与《实践论》（毛泽东）、《大众哲学》（艾思奇）、《社会学大纲》（李达）、《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等；文学作品：《子夜》（茅盾）、《家》（巴金）、《骆驼祥子》（老舍）、《屈原》（郭沫若）、《雷雨》（曹禺）、《生死场》与《呼兰河传》（萧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李有才板话》（赵

树理)、《王贵与李香香》(李季)等;音乐:《义勇军进行曲》(聂耳)、《松花江上》(张寒晖)、《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白毛女》(马可等)等;电影:《渔光曲》(蔡楚生)、《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桃李劫》(袁牧之编剧)、《风云儿女》(田汉、夏衍编剧)……真可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风光无限,气象万千。

这一脉左翼文化传统及其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既延续着“五四”新文化的现代精神,又奠定了新中国的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在传承“五四精神”的基础上全面开辟了新中国的新文化。具体说来,这种新文化一方面构成对抗国民党昏庸黑暗政治及其遗老遗少与殖民买办文化的崭新气象;另一方面为新中国确立了政治格局与文化方向,最终形成不可逆转的现代趋势:

当毛泽东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描绘一种新民主主义政体时,他同时也是在描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的确立过程,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文化意识的确立过程。可以说,20世纪中国革命的高潮,也是近代中国人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最为明晰的时刻(张旭东《离不开政治的文化自觉》,载《文化纵横》2012年4月)。

第三次浪潮则以邓小平时代为契机,既涉及改革开放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的革新探索,更关乎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解放,从而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形成100年来前所未有的国家强盛与精神独立的时代气象。其间,又可分为两次思想解放高潮,一是3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二是如今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潮流。前者关键词是“实事求是”,后者关键词是“文化自觉”。特别是当下这一更为艰巨、更为重大的思想解放潮流,既源于费孝通为代表的日益涌动的自觉自醒意识,以及国家战略大力推进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包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现实运动;同时,更在于中华民族作为独立自主的现代政治共同体,越来越清晰的历史使命或历史宿命。换言之,经过100多年的奋斗、探索与发展,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华文明的未来、中国人的安身立命等问题,已将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推向历史的主航道。

将《东方红》置于这种语境中审视,能够更深切地理解其中的文化政治与现代意味,进而透视现代文化及其建设与传播的内在规律与外在条件,并汲取历史的镜鉴与思想的启迪。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战略规划，文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核心命题。借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的形象说法：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挨打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挨饿问题”，未来30年将致力于解决“挨骂问题”，而这个问题眼下已经越来越突出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中尖锐指出：

跨国资本与民族利益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今天乃至明天的主要矛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是摆在每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巨大难题。然而，目前充斥我国知识界的恰恰是山寨版产品，乃至精神垃圾；学术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卡通化、杂文化、低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凡此种种所承载或导致的价值混乱和认知错乱愈演愈烈（《“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载《文汇报》2012年7月6日）。

如今，上上下下对文化的重视非比寻常，相较当年许世友将军听说毛主席号召领导干部多读《红楼梦》，发牢骚说自己不看“吊膀子”的书，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口号更是如雷贯耳，中国俨然成为文化大国了。当然，真正使文化成为“文而化之”的精神食粮，不单单是良好的愿望、积极的表态、实际的作为就能成就的。联系《东方红》的经验——除了领导人亲力亲为、举国之力共赴之、不计名利等特殊的时代背景，首要的还在于将文化置于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化的层面认识，而不是满足于“丰富生活”、“调剂身心”、“吹拉弹唱”、“风花雪月”等一般化理解。同时，将文化真正作为文化，正心诚意，痴心向往，而非将文化视若现实功利的“敲门砖”，诸如“政绩”、“软实力”、“GDP增长点”、“利润”、“市场”、“收视率”、“发行量”等——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云云。

举例来说，“文化产业”就显得不伦不类，好似美感与快感齐飞，灵魂共物欲一色，至少由文化而产业、进而产业化堪称文明史的空前奇观。仅就现象而言，一边是产业扰扰攘攘，一边是文化凄凄惶惶，二者是否具有“同构”关系暂且不论，“平行”关系则为不争事实。学界腐败、学人无行、艺术沦为名利、媒体乱象丛生等均为表征。在一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心目中，文化、文化产业、文化大发展似乎意味着征地、开发、园区、动漫、游戏、会展、旅游、大片、大制作、声光电、媒体技术、媒体融合，甚至选美，等等。诚然，文化需要市场，

也离不开阿堵物，正如文化人也得安居乐业。据说“先进”的美国就将文化与产业一锅煮，恐怕更多是误读。然而，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市场即使再发展、再繁荣，阿堵物哪怕堆成喜马拉雅山，也永远堆不出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贝多芬、雪莱、普希金、拉赫玛尼诺夫，堆不出《三国演义》《红楼梦》《一千零一夜》《莎士比亚戏剧》《堂吉珂德》《天鹅湖》《英雄交响曲》《黄河大合唱》，堆不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国学四大导师……归根结底，文化是灵魂的翔舞，精神的欢歌，生命的悸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文化更是立国之魂，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倘以“非文化”、“伪文化”乃至“反文化”的思路对待文化(产业)，则无异于南其辕而北其辙。道理很简单，既然没有对文化的眷恋与痴迷，一门心思只想着用“文化”谋求其他“利益”，那么文化本身怎么可能繁荣发展呢？文化学者黄纪苏的批评切中肯綮：

电视台广大职工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也不想下三滥，但上面定了产业化大方向，下了收视率、广告收入硬指标，不下三滥，我们不得下岗么？（《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

三

这部别具一格的文化名人访谈录，有多位年轻的清华、北大学人一同参与，而总其成者是黄卫星博士。

黄卫星博士，祖籍湖北蕲春，硕士生与博士生阶段均受业于蒋孔阳先生高足、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权威张玉能教授，博士学位论文《审美价值观的传播与建构》已由人民出版社付梓。

2010年夏季的一天，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打来电话，举荐江西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来做博士后研究，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黄卫星博士。恰好自己正想再为手头的国家社科重点基金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物色一名博士后，之前已有初步预期人选。单从学科背景等条件看，黄博士同该项目似显疏离，说实话我有些碍于朋友情面，请她一并前来参加面试。结果出乎意料，最初看好的人选名落孙山，而她得到面试专家的一致认可。入站以来，她更以优异的表现进一步证明我们的选择，仅2011年就发表二十余

篇学术论文，包括《现代传播》《文化研究》《新闻学论集》等权威期刊，从而获得本年度学院唯一的博士后中期考核优秀成绩。

犹记我与黄博士第一次相见，是在自己一周一次的例行开放时间。当晚，夜雨骤降，水流成河，学院办公室里少了往日的欢声笑语。顶着狂风暴雨，她如约而来，一袭旗袍，优雅娴静，行礼如仪，从容淡定。伴着音响里悠然飘荡的音乐，我们随意聊起研究设想，擘画着如何同国家项目有机契合。不知不觉间，谈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新中国的文化经典，可从文化建设、文化传播、文化研究多方面展开探讨，而这些方面正是她的学科专长。于是，我们越聊越具体、越深入，思想深处不时迸发着灵感与火花，最后甚至不无挺枪跃马的亢奋，犹如秋高草肥的匈奴骑兵跃跃欲试。

两年之后，茫茫沙漠的旅人终于看到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当初幼芽似的朦胧设想如今一点点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围绕《东方红》研究，这位宛如清扬的江南女子不仅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涉及《清华大学学报》《对外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等期刊，更完成两部研究专著，一部是三十余万字的出站报告《新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传播研究——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例》，纳入我主编的“新中国新闻传播史丛书”；另一部就是《〈东方红〉创作者口述史》。两书珠联璧合，息息相通，前者是系统厚实的理论研究，后者是鲜活丰满的口述文献。而在我看来，后者的参考启发价值或许更为突出，因为正如钱锺书《管锥编》所体现的意味：各路宏大叙事与理论体系迟早都可能化为残垣断瓦，而实实在在的一鳞一爪往往具有恒远的意义。

采访录中的人物既是《东方红》的主创人员，又是新中国与新文化的风流人物，从作曲家周巍峙到词作家乔羽，从歌唱家王昆、才旦卓玛、李光曦到舞蹈家欧米加参，从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陆祖龙到受业于清华大学的茅沅……这些文化名人为《东方红》付出自己的艺术心血，更为新中国的文化星空留下一串串熠熠闪耀的经典：《志愿军战歌》《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情深意长》《映山红》《瑶族舞曲》《北京的金山上》……从他们的访谈录里，我们听到看到最多的是周总理、精品、经典、丰碑、里程碑、精气神、激情燃烧、空前绝后等，同时还有他们对文化艺术的真切感受与朴素思考：

欧米加参：当时参加《东方红》演出的演员，基本各有各的故事。我们经历过旧社会，也经历过新中国，所以有一种直观的生活体验，知道应该怎么

表现。当时排练的时候基本上是义务劳动，呵呵，但大家都很开心。记得很清楚的是，总理那个时候作为总导演，对于整个文艺界都是很熟悉的，谁到了谁没到，总理都记得的。演员的精神状态也跟现在很不一样。后来排练的《复兴之路》，取材、灯光、技巧、音乐等技术层面都特别好，但是总感觉在精神状态上现在的演员是体会不到的。比如现在很多演员走穴，我总觉得心里特别扭，因为我最开始就是像走穴一样，到处流浪，到处挣钱，最后成了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开始了新的生活，不再卖艺了。可是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又回去了，只要给钱我就唱，有点像轮回啊，呵呵。现在说文艺工作要这样要那样，我觉得我们当时靠的就是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

邓玉华：我挺拥护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文艺就要为人民服务。有一段时间批判，说文艺为政治不对。那要看怎么说，一个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主义，你说是不是政治？这就是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要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你不能避开这个性质，不说为政治服务，不说不等于不存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爱祖国，爱中华民族，就相当于你爱你的家，爱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要团结、要友爱，要互相帮助，56个民族大团结，这是不是政治？这都是政治。文艺就要为政治服务。

周巍峙：现在大多数艺术家都奔着钱，给歌星写歌5万、10万，却和人民没有交流。有一篇文章批评演员“请天上飞的下来看看”。很多时候节目只要表演完，演员就马上坐飞机走了。有时候配音都没有配好，他也不管，演出结束后拿了钱就坐飞机走了，因为下一个表演在等着他。

陆祖龙：我觉得现在是国家富了，但艺术团体不行了。除了部队的艺术团体，部队有钱，其他的艺术团体都不行啊，都要倡导产业化、市场化。我爱人本来是北京歌舞团的，但现在变成一个演艺公司了。改制后也搞舞剧，但花了几百万，演不了几场就不演了。为了生存，去跟旅游公司订合同，跑到旅馆和餐厅里去演出。可能我看得片面了。当然也有些剧本来就是市场化的，有的改革也成功了，就像杂技现在改革了就很好，衣服也很漂亮，演出效益很好。但我觉得文化艺术团体不能全部走向市场化，国家还是应该担负起来。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有自己养着的文艺团体，好的艺术家都是国家养着的，没有说自负盈亏的，文化艺术与市场不能等同。

……

参与此书采访、整理与编辑的几位清华北大硕士生、博士生多为“80后”，他们在走进这些文化名家的世界时，也留下自己的点滴感悟：

学者阎云翔说：“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我想，不仅是农村，我们整个社会都面临着这种真空带来的虚无和危险。

（蒋肖斌，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有人问音乐、文学等艺术有什么用，不能吃不能穿，更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曾因这样的质问而语塞沉默。听了黄卫星老师与乔羽老师的访谈录音之后，我想试着回答他：有一种美和情怀不是为了有用而存在，那是为了听拍岸的大河浪花、闻两岸稻花香、看海上点点白帆，是即便经历波折，依然能够夜奔八千里路、披着云和月为祖国奉献的纯真和激情。

（杨荣荣，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他们一定是很坚定的红色一代，他们一定有毫不动摇的信仰，可是，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坚定，我无从知晓。直到我看着眼前口齿不怎么清晰但精神依旧矍铄的老艺术家（欧米加参），努力想象着当年流浪卖艺的年轻小伙的模样，我才慢慢消除了心底由来已久的疑惑。听老师讲辗转流浪的生活经历如何凝练成《东方红》中5分钟的藏族舞蹈，讲50年代的艺术如何到基层演出、一连8个月与百姓同吃同住，才会觉得“艺术创作要体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真的不是一句空话。

（杨丽娟，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

从本书的文化人身上，可以感受九死未悔的时代精神；从采访他们的青年学人身上，可以嗅到薪火相传的精神气息。21世纪以来，这种传承由星星之火而蔚为燎原之势，从轻描淡写而渐显浓墨重彩，仅看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的新动向就可堪欣慰。如罗小铭主编的《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上海书店2011），就收录了多篇可圈可点的学术成果：安徽师范大学中文

系丁云亮的《识字的政治——1950年代上海工人的学文化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张炼红的《“红色经典”的想象政治与“革命中国”的认同困境——以〈沙家浜〉史事演义为个案》、复旦大学中文系倪伟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释读》、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张硕果的《1950年代早期上海的电影文化论争与改造——从“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讨论到“文艺整风学习运动”》（博士论文《论上海的社会主义电影（1949—1966年）》一节）等等，显示了思想文化波涌浪翻的新潮流。比如，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伟对户县农民画的阐述：

我们显然不能因为户县农民画与时代政治的这种瓜葛就全盘否定其功绩。在户县农民画的历史中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它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艺术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笼罩着“天才论”的神秘色彩。长年累月、坚持不懈的美术普及教育，使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民掌握了绘画的技能，并由此而发现了自己的创造潜能，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已经站立起来的阶级，是有能力创造文化的，也有能力创造自身乃至整个社会、国家的崭新历史。正是艺术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

这场雄心勃勃的文化革命，目的在于创造一种与封建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都迥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化形态，它召唤“工农兵群众”，希望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地担当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

……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黄卫星博士及其年轻群体，同样属于这脉文化传承的后起之秀，属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与传播的风流人物。伴随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然崛起以及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时代潮流，他们的点滴心血也将融入《东方红》的风云画卷。

是为序。

2012年于清华园